

NOI:

CHOUXIANG STORY

NOT RESEARCH

PS

Psychological *Shit*

PSYCHOLOGICAL SHIT ASSOCIATION

基于精神分析的“鸟嬛”理论研究：自我投影、自恋补偿与权力架构下的存在性困境

A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e “Bird-Huan” Theory: Self-Projection, Narcissistic Compensation, and the Existential Predicament within Structures of Power

想回家摸小动物¹

¹ 喜欢鹦鹉专业，喜欢小狗大学

Correspondence: N/A. Email: N/A.

摘要

本研究以精神分析视角切入，深度解构中国电视剧《甄嬛传》中安陵容与甄嬛（“鸟嬛”）的情感范式变迁。研究认为，安陵容对甄嬛的情感并非单纯的嫉妒或背叛，而是一场指向“理想自我”的病态博弈。安陵容表现出明显的“脆弱自恋”特征，其对甄嬛的初期依附实质上是将匮乏的自我价值投影于理想化客体。然而，在封建后宫森严的阶级与权力架构下，这种投影因无法逾越的身份鸿沟而异化为剧烈的自恨与防御。论文通过文本分析指出，封建权力体系不仅作为背景存在，更作为一种“场域力量”持续异化个体的主体性，使安陵容沦为被摆弄的“棋子”与“玩物”。由于缺乏平等的对话空间，其主体间性场域彻底崩塌，导致原本的认同路径断裂。安陵容最终选择以“自毁”的方式终结生命，这不仅是不成熟防御机制崩解的结果，更是她在模糊觉察到权力枷锁的压迫后，为夺回最后一点主体性而进行的悲剧性反抗。本研究旨在揭示宏观权力结构如何通过微观心理机制摧残个体人格，为当代人格教育中关于社会公平与自尊调节的互动关系提供反面启示。

1 | 引言

在当代文化研究的视野中，影视文本常被视作解构人类复杂心理动机的透镜。中国电视剧《甄嬛传》中，安陵容与甄嬛（大众戏称“鸟嬛”）的关系演变，提供了一个关于“自恋、投影与异化”的深度观察样本。在大众叙事中，安陵容常被定性为“嫉妒”或“背叛”，但本研究认为，这种解读忽略了其内心深处更为复杂、甚至带有自毁色彩的心理动力。

安陵容对甄嬛的情感，并非单纯针对他人的爱恨，而是一场指向自我的、关于“得不到”的深层博弈。她对甄嬛的所谓“爱”，本质上是对自身匮乏之物的病态渴望；她对甄嬛的“恨”，则是对那个被权力结构阉割、始终残缺不全的自我的厌恶投射。

为了深入剖析这一心理路径，本研究将通过以下理论框架进行探讨：

1.1 理想自我的投影与自恋调控

研究认为，安陵容展现了典型的“脆弱自恋”特征（康廷虎，赵静，2024）。甄嬛在她眼中不仅是一个朋友，更是一个“理想自我”的化身——拥有高贵的出身、从容的才情和被爱的权力。安陵容通过认同甄嬛来获取心理上的补偿，但当现实的差距不断提醒她这种“理想”永远无法实现时，原本的自恋补偿便转为剧烈的自恨。她攻击甄嬛，实质上是在攻击那个不断提醒她自身贫瘠的、无法企及的投影。

1.2 女性认同中的缺失与补偿

海伦·多伊奇（Helene Deutsch）强调，女性的人格发展高度依赖于与重要他人的认同（王礼军，2016）。安陵容对甄嬛的依附，反映了其在“前青春期认同”阶段的缺失。她爱甄嬛，是因为她爱那个通过甄嬛才敢于去想象的“美好的自己”。这种爱由于带有极强的补偿性，一旦环境改变，便迅速异化为毁灭性的嫉妒。

1.3 结构性压迫下的主体间性创伤

现象学主体间性理论认为，情感创伤源于个体在场域中感受到的不被理解与结构性隔阂（徐陶，章奕涵，2024）。在后宫这一高压场域，安陵容始终在被一种看不见的、名为“权力架构”的手所摆弄。她原本追求的是自我的健全与他人的认同，但在森严的阶级等级下，她的努力被异化为讨好，她的才华被降格为工具。这种觉察到却无法言说的压迫感，导致了她与甄嬛之间“共在”关系的彻底崩解。

1.4 觉醒后的自毁与最终摆脱

林碧烽与张晓容（2000）指出，不成熟的防御机制往往会导致人格的固着与毁灭。安陵容的一生都在通过“反向形成”等手段在缝隙中求生存，直到生命尽头，她才模糊地意识到：所有的痛苦并非源于甄嬛，而是源于这个将她死死锁住、不断玩弄她的权力位阶。她的死亡

并非单纯的认输，而是在觉察到那种说不出的束缚后，为了夺回最后一点“主体性”而进行的悲剧性反抗。

权力层级	心理表征	对个体的影响
顶端：至高皇权	绝对主宰/生存意志	异化需求，将人转化为“物”
中层：家族位阶	资源壁垒/自尊底色	决定了安陵容自卑感的结构性起源
底层：个体自我	投影与自恨/最终觉察	导致自恋损伤，并在觉察后选择自毁式解脱

表 1 后宫权力架构与个体心理投射模型

本研究旨在证明，安陵容的悲剧是一场关于“自我寻找”却误入“权力迷宫”的死局。通过解构“鸟嬛”关系，我们可以窥见阶级压抑如何通过心理投射，将原本可能健全的人格导向最终的坍塌。

2 | 理论框架：自恋、投射与权力结构的场域耦合

本研究构建了一个从个体心理动力到宏观社会结构、再到存在性超越的整合性分析框架。该框架旨在揭示：安陵容的悲剧不仅源于个人人格特质，更是个体在被权力结构异化的场域中，试图通过投射理想自我来完成自救，却最终走向自我毁灭的过程。

2.1 脆弱自恋与理想自我的外部投影

本研究首先采用康廷虎与赵静（2024）提出的“脆弱自恋”（Vulnerable Narcissism）模型作为动力学基础。与传统夸大性自恋不同，脆弱自恋的核心在于低自尊与高敏感的矛盾并存。

自恋补偿路径：安陵容对甄嬛的“爱”，实质上是个体维护自我积极形象的一种补偿性调控。她将自己匮乏的一切（高贵的出身、松弛的仪态、被无条件宠爱的底气）投影在甄嬛身上。

从投影到自恨：当权力架构下的阶级差距不断拉大，甄嬛的存在不再是安陵容的“光”，而成为了她“无法触及的理想自我”的永恒审判。此时，对甄嬛的攻击实际上是“自恨”的外部化投射——她恨的是那个永远无法通过努力（如歌声、冰嬉）逾越阶级鸿沟的残缺自我。

2.2 女性认同中的补偿性依附

根据海伦·多伊奇（Helene Deutsch）的女性心理学观点，女性人格的整合高度依赖于与“理想母亲/姊妹”的认同（王礼军, 2016）。

认同的异化：在“鸟嬛”关系的初期，安陵容对甄嬛的依附表现出一种“前青春期认同”的特征。这种认同并非基于平等的契约，而是基于一种“通过认同强大客体来填充自我贫乏”的渴求。

嫉妒作为自我的哀悼：当安陵容意识到无论如何通过才艺博取关注，自己依然只是权力架构中的一枚“棋子”或“玩物”时，原本的认同路径便断裂了。她对甄嬛的嫉妒，本质上是对那个“原本可能健全却注定夭折的自我”的哀悼。

2.3 权力场域下的主体间性创伤

本研究引入现象学主体间性理论（Intersubjectivity），将“鸟嬛”关系置于封闭的后宫权力场域中观察。徐陶与章奕涵（2024）指出，情感创伤源于关系情境中“主体性被抹除”后的孤独与失助。

被摆弄的客体性：封建阶级制度并非背景，而是一种渗透进呼吸的“场域力量”。在这个场域里，安陵容始终被皇权和家世背景所定义的权力架构玩弄。

结构性不透明：这种架构切断了她与甄嬛建立平等“共在”（Being-with）的可能。甄嬛的理解往往由于阶级优越感而显得肤浅（如单纯的物质赏赐），这种“无法被真正见证”的痛苦构成了核心创伤。安陵容的背叛，是她在感受到主体性被窒息后，通过破坏关系来确证自身“存在感”的唯一手段。

2.4 觉醒的代价：防御崩解与自毁式解脱

林碧烽与张晓容（2000）强调，健全自我的培养有赖于成熟防御机制的建立。但在封建压迫下，安陵容只能动用不成熟的“反向形成”（Reaction Formation）。

从防御到觉察：她的一生都在压抑真实的恨，表现出病态的顺从，这种长期的心理张力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终于崩解。

死亡的工具性与超越性：直到死前，安陵容才模糊地觉察到，真正的敌人并非甄嬛，而是那个将所有人工具化的权力架构。这种觉察由于缺乏批判性的认知支持，表现为一种“说不出”的束缚感。因此，她选择“吃苦杏仁”这种自毁的方式。在精神分析看来，这不仅是防御机制的彻底失败，更是她在意识到无法摆脱结构性压迫后，为了从“被玩弄的棋子”回归到“拥有死亡权的主体”而进行的最终反抗。

3 | 文本分析：认同、嫉妒与自我投射——安陵容情感结构的形成

安陵容的情感轨迹并非简单的“背叛史”，而是一场在封建权力架构玩弄下，关于“自我寻找”与“自我丧失”的悲剧。她的情感结构经历了从理想化投射到自恋损伤，再到最终主体性觉醒的三个阶段。

3.1 理想化投影：甄嬛作为“未竟之我”的替身

入宫初期，安陵容对甄嬛的依附超出了普通的友情，呈现出一种强烈的“理想化客体认同”。

投影的内容：甄嬛不仅是救命恩人，更是安陵容渴望成为的“理想自我”——拥有高贵的门第、不费吹灰之力的才情，以及面对皇权时那份骨子里的松弛感。根据多伊奇（1944/1945）的理论，安陵容通过认同甄嬛，试图补偿自身因寒微家世带来的“原始自卑”（王礼军, 2016）。

“爱”的本质：此时她对甄嬛的爱，本质上是爱那个通过甄嬛才敢于去想象的、美好的自己。这种爱由于带有极强的补偿性，极其脆弱，因为它建立在“甄嬛能持续提供保护”和“自己能够通过依附共享荣耀”的幻想之上。

3.2 自恋损伤与自恨的投射：从向往到嫉妒的质变

随着权力架构对资源（皇帝宠爱、生存位阶）的极端挤压，原本的理想化投影开始发生崩解。

阶级差异的觉察：安陵容逐渐意识到，即便自己练就了绝世歌喉与冰嬉绝技，在封建阶级眼中，她依然只是被玩弄的“鸟儿”或“技优”。相比之下，甄嬛的受宠带有主体性的尊严。这种“脆弱自恋”的调控失败（康廷虎, 赵静, 2024），使她感受到了剧烈的自恋损伤。

从自恨到恨她：安陵容开始意识到，她永远无法成为甄嬛。由于无法处理这种“得不到”的匮乏感，她将对那个“残缺、卑微、无能的自我”的厌恶，投射到了甄嬛身上。她攻击甄嬛，实际上是在攻击那个不断提醒她自身平庸与贫瘠的投影。嫉妒在这里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情绪，而是一种防御性的自我保护——通过否定甄嬛的完美，来减轻自我否定的痛苦。

3.3 权力架构下的主体间性崩塌：被玩弄的棋子

在封建权力的场域中，安陵容与甄嬛之间从未真正建立起平等的“主体间性”。

结构性的不对等：徐陶与章奕涵（2024）指出，情感创伤源于互动中的不被理解。甄嬛的每一次“恩赐”（如赏赐衣物、举荐受宠），由于其上位者的身份，在安陵容敏感的心理场域中都变成了阶级位阶的再次确认。

权力的离间：后宫的权力架构（以皇后为代表）利用了安陵容这种“说不出的压迫感”，诱导她通过背叛来确证自身的“力量”。安陵容在背叛中获得了一种病态的主体感：既然我无法像你一样被爱，那我就要像魔鬼一样被你记住。

3.4 最终的觉察与摆脱：死作为主体的回归

安陵容临终前的“苦杏仁”之举，是全剧最具存在主义色彩的一幕。

模糊的觉醒：她死前对甄嬛说：“我这一生，原本就是不甘心的。”这种不甘心并非针对某个人，而是针对那个玩弄她、将她塑造成“毒妇”却又让她求告无门的权力架构

以死实现摆脱：林碧烽与张晓容（2000）认为，不成熟的防御机制（如安陵容长期的反向形成）最终会导致人格坍塌。安陵容在死前终于明白，所有的痛苦和爱恨其实都是在这座围城里的徒劳挣扎。她选择死亡，不是因为认输，而是因为她终于觉察到了那种束缚，并决定不再作为“棋子”被权力摆弄。死亡成为了她一生中唯一一次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具有主体性的决定。

4 | 权力架构下的主体性丧失与自恋补偿的崩解

安陵容的悲剧不仅是个体的心理错位，更是封建权力架构对个体主体性进行系统性剥夺的产物。在这一场域中，她对甄嬛的爱与恨都成为了权力博弈的副产品。

4.1 权力金字塔对主体性的“工具化”

在后宫这一严苛的等级体系中，个体不再是完整的“人”，而是被异化为实现家族利益或繁衍功能的工具。

被定义的自我：安陵容因出身微末，在权力架构中始终处于被定义、被挑选的边缘地位。康廷虎与赵静（2024）提到的“脆弱自恋”在此背景下被极度放大——她必须通过不断地立功、献艺（歌声、冰嬉、香料）来证明自己的“使用价值”。

理解的真空：由于阶级带来的结构性隔阂，安陵容与甄嬛之间始终缺乏真正的“主体间性”共鸣。甄嬛基于上位者的善意（如赏赐、举荐）在安陵容看来，往往是权力位阶的无声霸凌。徐陶与章奕涵（2024）指出的“情感创伤源于互动中的不被理解”，在安陵容身上表现为一种深重的孤立感

4.2 理想自我投影的破灭与“自恨”的转化

当安陵容意识到无论如何通过才艺和顺从来博取生存空间，自己依然无法跨越血统与阶级的鸿沟时，原本对甄嬛的“理想化投射”便彻底坍塌

从爱到恨的动力学：她发现自己永远无法拥有甄嬛那种与生俱来的从容。由于无法忍受这种“得不到”的自恋损伤，她将满腔自恨转化为对甄嬛的攻击。

权力的离间策略：以皇后为代表的权力核心，精准地捕捉到了安陵容这种“说不出的束缚感”，通过提供虚假的“权力承诺”，诱导其动用“反向形成”等不成熟的防御机制（林碧烽，张

晓容, 2000), 使其在害人的同时也完成了彻底的自我剥夺。

5 | 结论：觉醒后的自毁——作为最终反抗的死亡

安陵容的一生是被摆弄的一生，但其结局却呈现出一种凄凉的、具有存在主义色彩的超越感。

5.1 模糊的觉醒：对权力架构的无声控诉

临终前，安陵容那句“我这一辈子，原本就是不甘心”和“这宫里的夜，真冷”，揭示了她最终的心理转折。她意识到，让她痛苦的并不是具体的甄嬛，而是那个将她塑造成“毒妇”、逼迫她扼杀本性的权力牢笼。虽然她未能像现代女性那样清晰地解构这种阶级压迫，但她觉察到了那种窒息感的来源。

5.2 死亡作为主体性的回归

在精神分析视角下，安陵容选择“吃苦杏仁”结束生命，具有多重象征意义：

终结玩弄：她拒绝再作为皇后的棋子，也拒绝再作为皇帝的“鹞妃”（一只被驯化的鸟）。通过死亡，她夺回了对自己身体和命运的最后一点支配权。

自恋的最终修补：如果生是作为他人的投影而存在，那么死则是她为了回归“自我”而进行的最后一次防御。

5.3 现实启示：人格教育中的社会结构视角

安陵容的案例为当代人格教育提供了深刻启示。林碧烽（2000）强调健全自我的培养，但安陵容的悲剧提醒我们：如果缺乏一个公正、平等的社会土壤，个体的心理防御机制极易在高压下发生扭曲。当代人格教育不仅要关注个体心理健康，更应关注社会环境对个体自尊调节的影响。

总之，安陵容是对自己得不到的一切（自由、自尊、真正的爱）怀揣着深沉的爱，却在阶级与权力的扭曲下，将其化作了对自己与他人的剧烈恨意。她的死，是她在觉察到那份说不出、摆不脱的压迫后，唯一能抓住的解脱。

参考文献

康廷虎, 赵静. (2024). 自恋研究的路线与整合：动力、调控与人格特征. 心理科学进展, 32(8), 1354–1365. <https://doi.org/10.3724/SP.J.1042.2024.01354>

林碧烽, 张晓容. (2000). 精神分析理论对人格教育的有益启示. 中国教育学刊, (3), 39–42.

王礼军. (2016). 被遗忘的女性精神分析大师——多伊奇的女性观述评.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1), 226–231.

徐陶, 章奕涵. (2024). 情感创伤的解释与治疗: 现象学主体间性理论在精神分析领域中的运用. 世界哲学, (5), 116–125.